

源方面,东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数几乎为中部的1.5倍,而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比中部高出半年左右,每万人拥有的研发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是中部地区的3倍多。在科技意识方面,东部地区的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量是中部的5倍多,万人吸纳技术成果金额则是中部的近7倍。在科技活动产出方面,东部地区的万名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授权量是中部的近4倍,万人技术成果成交额是中部的10倍,万名研发活动人员向国外转让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则达到了中部的20多倍;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上,东部地区是中部的5倍多,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占经济增长份额上则达到了中部的6倍多。

三、政策优势

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钻石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素,还应考虑政府政策的作用。中央政府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优惠措施等无疑对区域经济具有重要影响,而各个区域地方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就各个省级行政区而言,由于它们都具有较大的地域范围,城镇等级体系完备,所以都具有很强的经济自组织能力。此外,很多相邻省或有关地市政府之间还常常通过各种制度化的定期会议等形式达成经济协作关系,谋求合作共赢。“东部隆起”首先得益于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以及东部沿海地区首先开放、优先发展的政策,而沿海地区的政府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也功不可没。

(一) 非均衡发展战略与政策向东倾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对资源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开始作相应的调整,从强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转向重视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和宏观经济效益,着重充分发挥和利用各区域优势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区位优势,在总体上实施了效率优先的以东部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至20世纪末,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向东部倾斜的政策措施。首先是对外开放向东部倾斜。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到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确定沿海经济开放区,形成了面积32万平方千米、人口1.6亿的广大沿海开放地带,并实行相应的优惠政策,这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其次是优惠政策向东部倾斜。国家对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从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如扩大当地政府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和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减免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和关税,扩大当地政府对外贸易的自主权和外汇留成比例,等等。再次是体制改革向东部倾斜。国家的许多改革方案和措施,或是先在东部地区试行和实施,或是较多地考虑东部地区的情况和需要。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上的先行及享有相应的政策优惠和国家的投资倾斜、改革